

【历史学研究】

重重危机的嘉道年间学术变化

王元琪

(西北大学 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要: 19世纪初期的清帝国面临人口激增、政治腐败、经济恶化等一系列社会危机。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学术界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正统汉学家开始反思汉学的流弊,强调经世与义理的今文经学的异军突起、关注边疆危机的西北史地研究热的兴起以及宋学批评汉学割裂知识和道德联系的学术理路等。

关键词: 历史学; 经学; 嘉道年间; 社会危机; 汉学; 宋学

中图分类号: B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06)04-0073-04

Changes of learning from the crisis situation in the period of Jiaqing and Daoguang

WANG Yuan-qi

(Institute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hought,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Shaanxi, China)

Abstract: The Qing Dynasty was confronted with numerous difficulties, such as increasing population, degenerating politics and deteriorating economy in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Correspondingly, clearer changes took place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These changes includes: orthodox Han began to rethink the malpractice, emphasizing reality and morality of Jin-wen Confucianism's suddenly arising,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hot study by history and geography in northwest China, disputing between Han Studies' and Song Studies'.

Key words: history;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period of Jiaqing and Daoguang; social crisis; Han studies; Song studies

0 引言

嘉道之际乃清代历史上一个较为重要的转折时期,“康乾盛世”早已是昨日黄花,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在呈现出明显衰败迹象的同时,学术界汉学一枝独秀的局面也有所改观。正如有论者谓:“清治至道光而极敝,清学至道光而始变。于是承平之日久,主溺晏安,大臣委蛇持禄,容说以为忠;士人汨没科举,诗书以干泽。虽有魁异杰出之才,不安固陋,而声气标榜,呼朋啸侣,桐城文章以学古,休宁名物以张汉,文史雍容,姑以永日,而辅世长民,以为非分。”^[1] 虽说学术的发展变迁有其内在理路的传承

性,但社会环境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本文考察这一时期的社会状况,对于深入理解嘉道之际的学术发展变化意义重大。

1 嘉道年间社会危机的表现

18世纪的大清王朝在大多数的时间里处于一片繁荣的社会景象中。到了19世纪初期,由于连年不断的农民起义、官僚体制的恶化以及走私海盗的猖獗,曾经的“康乾盛世”华服尽褪,呈现出千疮百孔的衰败景象。这种衰败体现在以下方面。

1.1 人口激增引发的严重社会问题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人口增长的突发期,从康熙

初年至嘉道年间,人口增长一直保持强劲的上升势头。据统计,在1802年~1834年的30余年间中国人口就增加了1亿,达到4亿多^[2]。人口激增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

首先,粮食生产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导致了粮食危机。乾隆中后期,粮食短缺已经成为全国性的问题,就连清帝国重要的产粮基地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等地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粮食不敷的现象。粮价上涨、哄抢粮食在全国各地都有不同程度的出现。为了解决粮食短缺的问题,清政府一方面大量从国外进口粮食,另一方面鼓励百姓垦荒。但是过度开垦使农业生态受到严重破坏,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加剧了天灾人祸的肆虐,引起了新一轮的灾难。

其次,人口激增导致贫民、移民、游民大量涌现,成为社会动乱的主要根源。有学者说:“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3] 106}。在以农为主的乡土中国,“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4]。移民是因生活所迫而背井离乡的,可是迁居地也不是什么皇道乐土,生存条件十分恶劣。于是,在他们走投无路的情形下,只有铤而走险,通过激烈的行动来改善生存困境。嘉庆初年,以川楚陕地区的移民为主体的白莲教起义就是其中的最著者。持续9年的起义给清帝国政府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与此同时,游民问题也日益严重。据记载,“自乾隆末年以来,官吏士民,狼艰狈蹶,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3] 106}游民居无定所,漂泊不定,往往把参加会党当作谋食的手段。虽然会党组织的骚乱没有达到白莲教的暴动规模,“但它们在19世纪上半叶从未停止过。几乎所有的省份中都出现了农民起义,甚至在中国南方的省份中也首次发生了起义。”^{[5] 444}这给清王朝带来巨大的威胁和灾难。

1.2 以吏治腐败为特征的政治弊端日益严重

清朝吏治的腐败主要表现为贪污和变相贿赂的盛行。古今中外都有贪污,但像晚清那样几乎无官不贪却是极为罕见的。“有曾任直隶之涑水令者,言涑水每年收牛羊税,计共六百两,报销仅十三两,而藩司署费二十四两,道署二十两,州署十四两,余皆官所自得。又月领驿站费三百两,其由县给发,不过五十两,则每年获数千矣。”^[6]此一个案极其平常,但真实地披露了省、道、州、县各级衙门官吏分肥的惯例(所谓“费”均归私囊)。

另外,从乾隆中后期开始,变相贿赂成为官场司空见惯的行为,官僚们互相动用公帑请客、送礼、看

戏,这些费用都是合乎“礼”的大开支。例如,1842年初原闽浙总督颜伯焘被革职后途经漳州回广东家乡。“随帅兵役、抬夫、家属、舆马仆从几千名……酒席上下共用四百余桌。”搬运搜刮来的物资等历时十多天“扛夫过境,每日总在六七百名”。招待费用全由当地官府负担,“实用去一万余金”,当地财政困难,只好虚报乡勇一千二百名的粮饷去填补^[7]。已革职官员过境尚且如此,在位者过往更可想而知。

嘉道时期吏治败坏还表现在纳捐买官的盛行以及朝廷上下文恬武嬉、徇情枉法、避祸趋利等方面。日益严重的政治弊端进一步加剧了乾隆末年以来的社会危机。

1.3 政府财政状况的恶化

乾隆后期以来,随着官员贪污的普遍盛行,奢侈浪费等行为的不断升级,再加上临时性支出(如应付战争、平乱、灾荒、治河等突发或偶发事件)的不断增多,政府的库存银两越来越少。到嘉庆后期,政府的库存银两从乾隆中期的8000多万两下降到1200多万两。另外,嘉道年间输入到中国的鸦片引起了中国外贸差额的突然不平衡。有学者统计,从1800年~1820年的20年间,共有1000万两白银流入中国,而在1831年~1833年短暂的两三年里,则有1000万两白银流出了中国^{[5] 446}。这种外贸差额上的突然不平衡加剧了日渐衰落的清帝国政府的财政危机。

2 嘉道年间的学术变化

嘉道年间危机四伏的社会环境,刺激了传统中国知识分子以“救天下为己任”的经世精神,改变了乾嘉以来汉学一枝独秀的学术局面。

2.1 正统汉学的自我反思

由惠栋开派,戴震等人光大的乾嘉汉学虽然全面地清理了传统的学说,尤其是传世的旧籍,使后辈学子研读古书时省却了一些精力,但这种治学理路不可避免地将乾嘉汉学引向狭窄的方向:流于纤巧与琐碎、舍本而逐末,使学术成为逃避现实的掩护所。这种弊端到了嘉庆中期以后已引起了汉学内部人士的不满。如段玉裁在《朱子小学跋》中检讨道:“喜言训诂考核,寻其枝叶,略其根本,老大无成,追悔已晚”。对于乾隆后期开始的官员贪污腐化的盛行以及整个社会风气的恶化,段玉裁认为此与汉学者将知识和道德割裂不无干系。他说:“今日大病,在弃洛、闽、关中之学不讲,谓之庸腐,而立身苟简,气节坏,政事腐,天下皆君子而无真君子,未必非表率之故也。故专言汉学,不讲宋学,乃真人心世道之

忧,而况所谓汉学者如同画饼乎!”^[8]404

另一位汉学大师凌廷堪也对汉学的流弊有清醒的认识。在他看来,汉学的流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目前侈谈康成、高言叔重者,皆风气使然,容有缘之以饰陋,借之以窃名”^[9]203-204;其二是为学不通世务,“搜断碑半通,刺佚书数简,为之考同异,校偏旁”^[9]200,不切时用。在凌廷堪看来,学者为学,当以通经致用为第一要务。若仅仅沉迷于残碑断简,考证其字形,而无关切民生大计及社会兴衰、成败得失,则大无益于学问。此外,新一代汉学家如焦循、阮元、王引之等人也对汉学积弊有所反思。

2.2 今文经学的兴起

清代今文经学的复兴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酝酿过程。以庄存与为代表的常州学派的出现基本上可以确定为今文经学复兴的标志。

乾隆晚年,专任和珅,大权旁落,与其一直大力提倡的“大一统”格格不入。庄存与“自顾以儒臣遭世极盛,文名满天下,终不能有所补益时务,以负麻隆之期。自语曰:‘辨古籍真伪,为术浅且近者也,且天下学童尽明之矣,魁硕当弗复言’”。^[3]141在这样的学术背景和政治环境下,庄存与竖起了今文经学的旗帜,开始了转变学风的研究。

庄存与之后,旗帜鲜明地提倡今文经学的当属刘逢禄和宋翔凤。刘逢禄幼承庄氏治学之法,专主今文经学,曾先后著《左氏春秋考证》、《春秋公羊何氏释例》、《公羊春秋何氏解诂笺》等,明确否定当时甚为流行的古文家观点,发展了庄存与的今文学,对公羊家的“三统”、“三世”说进行了更充分、详细的论述。特别是他的《春秋公羊何氏释例》,采用汉学家治学的方法,对《公羊春秋》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学界引起较大反响。

宋翔凤和刘逢禄的治学比较类似,早年即传承庄存与学术,中年以后又向著名的考据学名家段玉裁问学,兼通训诂考证之学。正是由于这样的学术背景,宋存与治经并不完全排斥古文,但重视阐发经说的“微言大义”。此外,他还推崇理学,把程、朱与董仲舒并尊。宋翔凤虽主《公羊传》,但对于“四书”同样很看重,他曾撰《论语说义》、《大学古义说》等书,认为《论语》即是今文学,传达的是孔子的微言大义,体现了经世致用的学术理想。

常州学派注重阐发儒家经典的“微言大义”,适应了嘉道年间的学术潮流和社会需要,并通过家族的一脉相传,发展壮大,从而为今文经学的兴盛奠定了基础。其后,龚自珍、魏源等人汲取常州学派寻求

义理的汉学思想,发展了这一学术路向,使得常州学派得以更加彰显。

龚自珍治学范围极为广泛,经、史、诸子、舆地等方面均有涉猎。龚自珍早年随其外祖父段玉裁、父亲龚丽正治汉学,但却没有拘守文字训诂,其治经主张通经致用。早在江藩以训诂和性理分别汉、宋写成《国朝汉学师承记》和《国朝宋学渊源录》时,他就提出了批评^[3]347。1819年,龚自珍北上参加会试时遇见了刘逢禄,乃从其治公羊学,从而迎来了学术上的重大转折。较之常州学派,龚自珍不仅常引《公羊传》义例批评时政,将论学与议政融为一体,而且打通诸经的“微言大义”。他立足于《春秋》“大义”,但又不囿于《春秋》,不仅重点阐发公羊“三世”说,而且将其推而广之,贯于《五经》。他认为:“三世,非徒《春秋》法也。《洪范》八政配三世,八政又各有三世。愿问八政配三世?曰:食货者,据乱而作。祀也,司徒、司寇、司空也,治升平之事。宾师乃致太平之事,孔子之法,箕子之法也。”^[3]46这表现了他对政事的关心及对美好“太平世”的期望。

与龚自珍齐名的湖南学者魏源,治学广涉经、史、诸子等,由于早年受湖湘理学及经世学风的耳濡目染,比较注重义理。在当时理学受到考据学强烈冲击而一蹶不振的学术背景下,魏源转而从今文经学阐发义理,著有《书古微》、《诗古微》等。其学术特点主要表现为不据传注,直求微言,与庄存与、刘逢禄等人的学风有明显的不同。庄存与、刘逢禄还不斥《毛诗》,魏源却直探三家,刘逢禄为东汉何休《公羊传注》做《释例》,魏源更直溯西汉,使《诗》、《书》等“复”于西汉,以“至于”道。

庸庸讳言,龚自珍和魏源的学术成就是经学义理化过程中重要的一环。龚自珍、魏源都受常州学派影响,但又都有所超越。正如有论者谓:“庄氏及刘、宋发掘的‘微言大义’重在彰显王权的理论依据,寻找维护现有统治秩序良方的良方,龚、魏则在‘三世’、‘三统’说中寻求社会变革的理论。”^[10]

经常州学派的倡导,龚自珍、魏源等人的承接,到了嘉道以后,今文经学已然成为晚清学界的一支生力军。

2.3 西北史地研究的兴起

道光时期,西北边疆危机的浮现使西北地区日益为世人所关注。嘉庆二十五年,张格尔在浩罕的支持下发动叛乱。叛乱不仅打破了新疆持续半个世纪的平静局面,而且也拉开了几乎持续整个晚清的西北边疆危机的帷幕。

面对新的社会形势,学术界首先做出了针对性的反映,具体表现为西北史地逐渐成为一些学者研究的重点领域。学者徐松首倡其风。徐松曾因事遣戍新疆七年,对天山南北两路进行过近一年的实地考察,对西北形势比较熟悉。张格尔之乱发生时,徐松刚刚谪戍期满,东返京师。很快,他受到新即位的道光皇帝的召见,因“奏对西陲情形甚悉”,被赏官内阁中书。道光皇帝还为徐松参与编修的《伊犁总统事略》撰序,并赐名该书为《钦定新疆识略》。这一际遇,使徐松在西北史地研究群中的影响大增。检视当时参与西北史地研究的学者,他们大都与徐松有交,或是徐松的旧友,或是徐松的新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学者间已经形成了一股前后衔接、亦师亦友的研究西北史地之风,并产生了一种研究西北史地的群体效应。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较为稳定的学术群体的基础上,西北史地学获得了极快发展。

嘉道年间从事西北史地研究的学者及其主要论著有:祁韵士的《藩部要略》,徐松的《新疆识略》、《西域水道记》,张穆的《蒙古游牧记》,姚莹的《康輶记行》,何秋涛的《朔方备乘》,沈尧的《新疆私议》、《西游记金山以东释》、《漳北滬南诸水考》、《西域小记》,魏源的《答人问西北地域书》,龚自珍的《御试安边绥远疏》等。在社会危机与边疆危机日益严重之时,这些学者的研究不仅为人们了解和认识西北提供了详实资料,而且也为统治者提供了决策参考,表现出明显的经世色彩。

2.4 宋学对汉学的反击

乾嘉时汉学如日中天,所谓“家家许、郑,人人贾、马”。当时,维护宋学的以安徽桐城的方苞、姚鼐、翁方刚等人为主要代表,他们“以孔、孟、韩、欧、程、朱以来之道自任,而与当时所谓汉学者相轻”^[11]。然而,翁方刚、姚鼐虽以理学为学术宗旨,进行研究时却汉学、宋学兼采。翁方刚对汉学家在语言文字方面做出的贡献备加推崇,姚鼐更主张义理、词章、考据三者并重,他们与后来那些严守宋学门户的学者有所区别。

直到称为“姚门四杰”的方东树、管同、梅曾亮、刘开才以扬宋抑汉为己任,汉学宋学之间的差异才变得明晰起来^[13]。其中对汉学提出系统批评的当属方东树。方东树曾久居阮元幕府中,有着深厚的考证学功底,参与过阮元主持的各种文献的编修,但对于阮元编辑的《清经解》及江藩撰写的《汉学师承记》,方东树给予了较为严厉的批评。他说:“江氏作《汉学师承记》,阮氏集《经解》,于诸家著述,凡不关小学、不纯用

汉儒古训者,概不著录。……徒以门户之私,与宋儒为难。非徒不为公论,抑岂能求真得是!不仅如此,乾嘉时期有名的汉学大师如惠栋、戴震、钱大昕、汪中、段玉裁、阮元等都成了他的攻击目标。

方东树对汉学最切中要害的批评当在于汉学家割裂知识和道德联系的学术理路。他说:“汉学诸人,坚称义理存乎训诂典章制度,而如考工本制,江氏有考,戴氏有图,阮氏、金氏、程氏、钱氏皆言本制,同时著述,言人人殊,迄不知谁为定论。他如秦氏赋役,沈氏禄田,任氏、江氏、贺氏、张氏宫室,黄氏、江氏、任氏、戴氏方服冕弁,各自专门,亦互相驳斥,不知谁为真知定见?”^{[12] 405}另外,对于汉学所强调的通经致用,方东树也提出了批评:“汉学诸人,言言有据,字字有考,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传注驳杂,援据群籍,证佐数百条,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徒使人狂惑失守,不得所用,然则虽实事求是,而乃虚之至者也。”^{[12] 276}

尽管方东树对汉学的批评“肆口无忌”,立言无节,甚至有人身攻击之嫌,但“其在汉学极盛之时,努力欲创一新趋,虽识解未深,魄力未宏,而颇有平坦浅易处,可以绳当时汉学病痛者”^{[8] 576-577}。

3 结 语

学术的发展变化根植于社会生活的土壤里,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环境的变化。嘉道年间学术界的变化正是体现了这一时期日益突出的“衰世”景象。不同学派的知识分子站在各自角度反思学术的发展路向,这既是对过去学术的总结,又是对未来学术发展的预测。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难免会有相互的责难和攻击,但毋庸置疑的是这种相对激烈的学术交流极大地促进了学术的发展。正是通过这样的相互交流,汉学内部今文经学异军突起,汉学和宋学由相互对立逐渐走向了融和的道路,成为道咸时期典型的学术形式。

参考文献:

- [1] 钱基博. 近百年湖南学风[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 [2] 陈旭麓.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 [3] 龚自珍. 龚自珍全集[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 [4]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5.

(下转第 90 页)

良好开端以及 2007 年初第四阶段的补充协议的达成, 需要配备切实有效的相关争端解决机制和完善机构和安排。现时 CEPA 的 2 个《安排》从 DSM 角度讲, 仍是为框架性的、略显粗略的轮廓性规定而已, 缺乏可操作性, 有待改进之处甚多, CEPA 也缺乏相应的配套机构。虽然 CEPA 明确规定有“先易后难、逐步推进”等的原则, 且“两岸四地”经贸关系是“一国四地”在不同时间以不同身份加入 WTO 后所形成的新课题, 我们既要看到它与其他类似区域自由贸易安排相比的特殊性, 也要考量到中国的现实情况, 即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主权国家下的“一国四席”的几个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之间的经济联合, 必然要有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CEPA 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中国国情和实际经济利益安排角度所作出的设计与规划的自由贸易区蓝图, 能体现其第 2 条“原则”中所规定的五项原则和灵活性、务实性等特点。为促成 2 个 CEPA 及早成功地扩及“一国四地”, 早日实现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之间以及 WTO 下“一国四席”大中华经济圈的繁荣和稳定与共赢、共发展, 我们应未雨绸缪, 齐心协力, 抓紧完善现行中国内地与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的 2 个 CEPA 之 DSM, 并继而完善 CEPA 的机构安排, 尽早健全 CEPA 的争端解决机构, 这必将会为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等 FTAs 的建设积累宝贵经验, 为中国国内的泛珠江三角区域的合作, 为中国与东盟自贸区的建设, 也会为整个亚太地区各国经贸的稳定发展和 FTAs 的建设, 提供一种崭

新的模式选择和经验借鉴。

参考文献:

- [1] 赵学清. CEPA 若干法律问题浅析[C] //孙琬锺, 赵学清. 入世后“一国四席”热点法律问题研究.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4.
- [2] 马进保. CEPA 框架下的经贸争端解决机制与程序[M].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5.
- [3] 李存捧, 胡春绣. 中国“入世”后大陆、香港、澳门经贸法律新问题研讨会综述[J]. 中国法学, 2002, 18(4): 187-190.
-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内地与香港澳门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法规适用读本[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4.
- [5] 黎四奇. ICSID、MIGA、WTO 争端解决机制评述[J].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 国际法学, 2004, 18(6): 14-19.
- [6] 林 峰. WTO 处理环境与贸易关系对处理两岸四地自贸区贸易与环境关系的启示[C] //王贵国. 区域安排法律问题研究.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 [7] 韩燕煦. 欧洲联盟先予裁决制度初探[J]. 法学家, 2000, 16(5): 49-53.
- [8] 谢兴龙, 师 萍, 李晓峰, 等. 国际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联度: 基于三个经济转型国家的比较研究[J]. 长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5, 7(4): 39-45.
- [9] 陈 萍, 孔 凯. 全球化趋势下两岸产业的使用与竞争关系[J]. 长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5, 7(4): 63-70.
- [10] 申 萍, 张宏民, 张 莉. 市场经济对合同自由原则的限制[J]. 长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6, 8(3): 78-81.
- [10] 罗检秋. 从清代汉宋关系看今文经学的兴起[J]. 近代史研究, 2004, 139(1): 1-46.
- [11] 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6.
- [12] 方东树. 汉学商兑[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 [13] 陈国庆, 徐晓霞. 试论晚清汉学与宋学之关系[J]. 长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4, 6(1): 1-4.

(上接第 76 页)

- [5] 谢和耐. 中国社会史[M]. 耿 昇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
- [6] 徐 珂. 清稗类钞[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7] 张集馨. 道咸宦海见闻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8] 钱 穆.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 [9] 凌廷堪. 校礼堂文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